

东亚区域主义的缘起与未来^{*}

——评《经济区域主义的政治学》

李金潼 朱 旭◎

【内容提要】 区域主义是二战后国际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凯文·蔡（Kevin G. Cai）基于既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结合全球/结构、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因素构建了一个关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在与战后多边主义的比较中，把世界区域主义进一步划分为“硬封闭”和“软开放”两种类型，较好地解释了世界不同地区的区域主义所呈现的不同形式。另一方面，蔡的研究在变量设置、关键因素的考察及对东亚区域主义的简单量化分析方面还有值得商榷之处。

【关键词】 区域主义 硬封闭 软开放 东亚

一、问题的提出

—— 战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实力优势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方式逐渐建立起以西方主要贸易国家为主导的自由国际经济秩

* 笔者对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致以诚挚谢意，文中错漏由本人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12/3（总第31期），第121—138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序 (Libera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强烈支持多边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 出于冷战地缘政治的考虑,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支持西欧战后恢复, 并允许西欧采取与多边主义原则 (Principle of Multilateralism) 背道而驰的区域主义 (Regionalism)^① 措施, 应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面对西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这种区域一体化方式也逐渐为拉美、非洲、亚洲等地区效仿。^② 自此, 区域主义通过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s) 成为战后国际经济中一股重要力量, 这也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第一次区域主义浪潮。^③

20 世纪 80 年代末, 东欧和苏联的剧变使得战后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铁幕”轰然落下, 人为的东西方割裂逐渐弥合, 世界再度联结在一起。随着冷战的落幕, 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美国以其压倒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优势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谋求建立和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特别是 2009 年“重返亚洲”战略从“口号”转变为行动后, 更不允许任何国家充当某个区域内的区域霸权, 以威胁其在

① 对“区域主义”的定义国内外学界未达成一致的看法, 因为它通常不仅意味着地理邻近, 还隐含着一种文化、经济、政治或组织的凝聚力。本文中, 区域主义主要用于指特定地理区域内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及组织凝聚力的国家间的互动。为了便于讨论, 本文没有进一步区分“区域主义”和“一体化”, 本文中二者的含义基本相同。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1。另外, 对区域主义概念的讨论可以参见 C. M. Dent, *East Asian Reg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Theodore H. C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Longman, 2003), pp. 273–310。

② 有学者认为, 西欧的一体化在启动后更趋向于一种内生性的发展, 而第三世界的 RTAs 则存在相当多的问题, 其中存在一对根本矛盾: 希望通过贸易自由化推动一体化的观念与企图借助进口替代促进工业化的保护主义逻辑之间的矛盾; 此外, 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且普遍反对 RTAs。因此, 这些效仿都没有成功。参见 Rune Dahl Fitjar, *The Rise of Regionalism: Causes of Regional Mobil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9); Theodore H. C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73–310。

③ 值得注意的是, 1949 年, 苏联与东欧国家 (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 组建了经济互助委员会 (CMEA)。尽管 CMEA 涉及技术合作等联合项目, 但以国家中心主义导向的共产主义政治经济体阻碍了迈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真实步伐。因此, 大多数学者认为第一次区域主义浪潮始于 1957 年欧洲经济共同体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和 1960 年欧洲自由贸易联盟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的组建。参见 Theodore H. Coh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Practice*, pp. 273–310。

世界各个区域的“自由”和利益。考虑到在欧洲的教训，美国在东亚更多的是构建以其为中心的“轮辐结构”（hub-and-spoke structure），不断离心东亚区域的联合倾向。与此同时，全球化趋势和新一轮区域主义浪潮揭开了序幕，世界经济焕发出久违的生机与活力，世界经济版图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推动了欧洲以联盟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北美自由贸易区在美国的主导下匆匆组建和运转；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逐渐展开和深入；新兴市场国家把握全球化的机遇，经济取得强劲发展；各种区域组织或安排明显增多（见表1）。曾经由西方少数贸易大国主导的经济版图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表1 不同时段区域贸易协定（RTAs）数量增加情况一览

年份	1947—1989	1990—1994	1995—2000	2001—2011	总计
时间间隔(年)	43	5	6	11	65
数量(个)	76	33	6	390	505

资料来源：表格为笔者自制，数据参见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数据统计时间截至2011年11月15日。

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时代特征为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既往的区域主义研究，特别是对欧洲一体化实践的研究涌现了很多有益的成果，涉及联邦主义、^① 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② 新制度主义^③及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等经典理论，为研究冷战和后冷战时代的区域主义提供了富有创见的思想。然而，这些理论绝大多数仍是基于欧洲的区域一体化经验，当用于解释其他区域特别是东亚^④的经济区域主义时则

① 参见 Leon Lindberg,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② 参见 Sajal Lahiri, “Controversy: Regionalism versus Multilateralism,”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8, No. 449, 1998, pp. 1126 – 1127; Albert Fishlow and Stephan Hagg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egion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ECD, 1992。

③ 参见 Joseph Nye,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68), p. 5。

④ 本文中的“东亚”范围限定在东盟10+3机制的所有国家、朝鲜和蒙古。

显得不太相关 (less relevant)。^①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的区域主义有什么差异? 为什么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会纷纷趋向区域一体化? 为什么不同区域的区域主义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东亚的区域主义和一体化进程有什么特点, 其前景如何? 加拿大学者凯文·蔡的新著《经济区域主义的政治学: 解释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 为我们从东亚各国及美国学者外的视角考察和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二、区域主义: 以东亚区域一体化为例

下文将首先论述区域主义这一分析框架, 然后对东亚一体化的案例进行分析。

(一) 区域主义: 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 二战后, 现代意义上的区域主义浪潮始于西欧, 尔后扩展到北美、拉美、东亚和其他区域, 与美国倡导的多边主义相左。冷战后, 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推进了国家市场 (national markets)^② 的全球化, 同时促进了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兴起和深入发展。区域一体化因区域不同而相异, 从西欧以政治动机和制度化为特征的一体化到东亚以市场驱动和“低制度化” (less institutionalized) 为特征的一体化,^③ 共同构成了世界区域主义的实践图景。有学者把前者称为“旧区域主义” (Old Regionalism), 即由国家和区域政府间组织主导、明确限定区域合作领域且具有内向 (introverted) 保护主义色彩政策导向的区域主义, 把后者称

① 参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reface, p. xii.

② 这是一个外来的概念, 亦即“全国市场”或“统一的国内市场”。对此的简单辨析可参见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 规模与空间结构》, 《浙江学刊》2010 年第 4 期, 第 5—14 页。

③ 参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1; 对衡量区域主义发展水平的论述还可参见 N. D. Palmer, *The New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91), p. 12.

为“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即由国家、市场、公民社会 and 外部行为体共同参与、具有广泛区域合作领域且具有外向(extroverted)开放色彩政策导向的区域主义。^①然而,蔡认为,无论何种形式或类型的区域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复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会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的性质和演变。^②

以往考察区域一体化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提供了富有创见的思考。如有的学者考察了一体化的范围和行为体的动机,但未能给予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更广泛的国际背景足够的重视^③;有的学者关注了外部事件和行为体的角色,却没有回答国家为何走向区域化(go regional)。^④由此,在蔡看来,它们都难以同时解释两个关键问题:(1)为什么民族国家致力于走向区域化?(2)为什么区域主义在不同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另一方面,虽然东亚区域成为当前世界最具活力的区域,但相较于欧洲一体化,解释东亚区域一体化的文献还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为此,蔡在已有关于经济区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全球、区域和国家因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总体考察世界区域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

在讨论之前,需要对有关概念进行区分。罗伯特·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界定了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和

① Fredrik Söderbaum, "African Regionalism and EU-African Interregionalism," in Mario Telò, ed., *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 Regional Actors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a Post-Hegemonic Era*, (Aldershot, England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2nd edition, p. 187. 对“旧”、“新”区域主义的讨论还可参见 Björn Hettne, "Beyo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 No. 4, December 2005, pp. 543-571; Jens-Uwe Wunderlich, *Regionalism, Globalis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Europe and Southeast Asia* (Aldershot, Hampshire 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②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2.

③ E. B. Haas, *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p. 9-11.

④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8.

帝国 (empire), 认为它们是相对立的现象。^① 简言之, 纯粹的经济民族主义仅仅是依靠经济的自给自足, 在现代世界这样的极端现象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冷战时的东方集团, 虽然它们几乎隔绝了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但它们集团内部是有经济往来的。另一方面, 一个世界帝国则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和一个世界政府下的单极权力结构, 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存在过, 古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也只是在较大而有限的区域内行使过权力。蔡认为, 世界经济生活是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现象, 其间能被普遍认同的是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多边主义是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倡导的原则, 意味着非歧视性, 即一国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给予其他所有成员国同等待遇, 这根植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经济区域主义意味着在既定地理区域内一组国家在经济事务中对彼此的特惠安排 (preferential arrangements)。^② 多边主义在战后的三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 但 20 世纪 70 年代后开始受到削弱, 并与逐渐壮大的区域主义力量形成了对照。蔡认为, 要判断世界经济是多边主义导向的还是区域主义导向的, 一个恰当而便利的方法就是比较在非歧视原则下与特惠贸易安排原则下的世界贸易比例。^③

大多数学者把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后的区域主义称为“新区域主义”, 蔡根据不同区域主义的特点进一步分为了“硬封闭区域主义” (hard-closed regionalism) 和“软开放区域主义” (soft-open regionalism)。前者指制度化、歧视性 (discriminatory) 的区域主义, 通常是政府间达成政治协定的结果, 如当今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就是典型代表; 后者指受市场力量驱动的非制度化、非歧视性的一体化进程, 尽管有时也会得到某些政府的鼓励和支持。通常情况下, “硬”区域主义趋向于

① 罗伯特·吉尔平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29.

③ 凯文·蔡在书中还介绍了其他判定方法, 即比较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在贸易和投资流动方面的比重、政府在解决对外经济问题诉诸多边与区域或双边机制频率的差异等。详细分析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 29 - 30.

“封闭”，“软”区域主义趋向于“开放”（见图1）。而区分“硬封闭”和“软开放”区域主义的标准主要是：制度化水平、歧视的程度、对域外国家的开放程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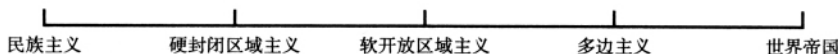


图1 世界经济秩序的形式

资料来源: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29, Figure 2. 1。

蔡关于经济区域主义的分析框架建立在一系列对全球或结构、区域和国家因素的假定之上。这些假定有以下四个。

假定1: 经济区域主义的出现首先产生于国家决策者、精英和利益集团对外部和内部必要性的感知。

假定2: 经济区域主义随后在速度、水平和形式上的发展取决于该区域在区域和国家层次上的特定条件。

假定3: 区域主义通常会带来连锁反应效应，即一个区域的区域主义可能引发其他区域的区域主义作为回应，并进一步加强这种趋势。

假定4: 经济区域主义是逐渐演变的，从较低层次的区域安排到较高层次并包含周边越来越多的经济体。^①

基于上述假定，蔡界定了某些重要变量以表征世界经济秩序的形式。^② 在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方面，这些变量包括：（1）区域主义的连锁反应效应，记作 C1；（2）国际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消极与积极效应程度，分别记作 C2、C6；（3）主要区域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记作 C3；（4）全球霸权权力的水平，记作 C4；（5）区域内国家经济结构的补充，

^①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32.

^② 详细的变量讨论可参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 33–35。

记作 C5; (6) 多边主义规范的盛行程度及国际机制的效力, 记作 C7。

如图 2 所示, 以 C1 为例, 某区域的区域主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效应, 即这种效应越强, 引发其他区域采取的对等措施就越多, 区域主义趋势就越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就被广泛视为是对西欧深入的一体化的直接回应, 自此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实质性地转变了对待区域主义的态度并积极参与其中。以 C2 为例, 如果国际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消极效应, 或者就像基欧汉和奈所说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水平越高, 则世界经济秩序越趋向于区域主义导向。20 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曾经出现的切断发展中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的呼吁可能源于对这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的不满。其他变量可同理推导得出相应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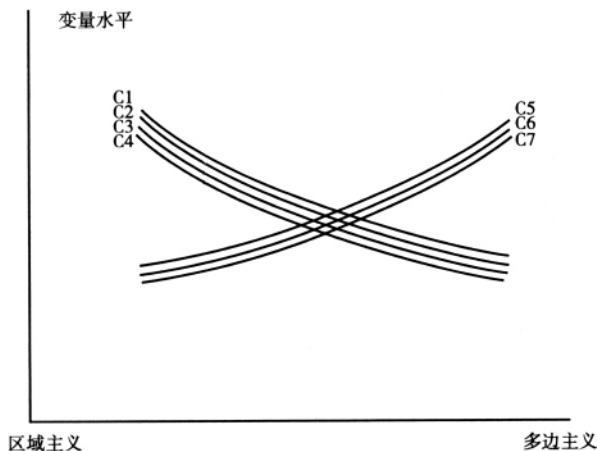


图 2 区域主义 vs. 多边主义

资料来源: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34, Figure 2. 3。

鉴于区域主义在不同区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形式, 蔡通过六个变量——(1) 区域内贸易的依赖度及其他经济交流, 记作 C1; (2) 区域外部的竞争, 记作 C2; (3) 区域政治信任和共识、历史联系、文化临近、

共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感和共有的利益，记作 C3；（4）与外部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联系，记作 C4；（5）区域经济体的竞争力，记作 C5；（6）区域内政治猜疑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多样性，记作 C6——来分别考察变量水平的高低差异对“硬封闭”和“软开放”区域主义的塑造（如图 3 所示）。^① 限于篇幅，仅以 C2 为例，即当某区域面临外部经济竞争越强烈，该区域的区域主义特征就越趋向于“硬封闭”，西欧的联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来自外界的经济竞争的回应；反之，则趋向于“软开放”区域主义（如 C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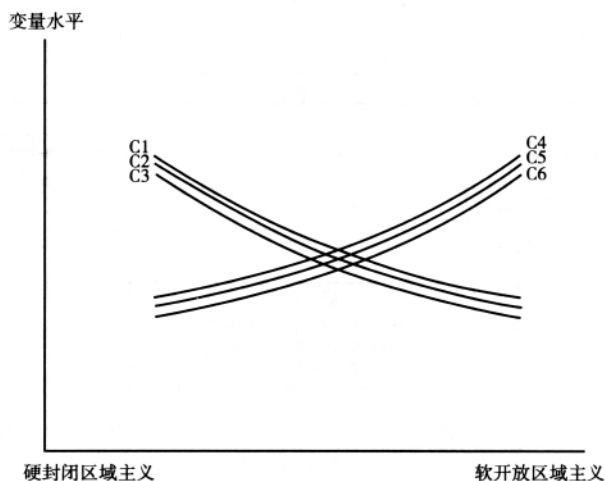


图 3 硬封闭区域主义 vs. 软开放区域主义

资料来源: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36, Figure 2. 4。

在蔡看来，区域主义的兴起和深入首先是由区域内外的必要性所引起。随着美国经济霸权的相对衰落及多边主义规范的弱化，尤其是冷战后各国为了应对外部挑战、提高国家经济在全球化浪潮下的竞争

^① 对变量的详细说明可参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 35–37。

力,更愿意走向区域联合。而任一区域主义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由区域内现存的区域与国家方面的条件(如区域政治信任与共识、经济结构的互补性等)以及不同区域与域外的不同联系决定的。并且,随着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条件的变化或演进,区域主义的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由此,蔡构建了一个经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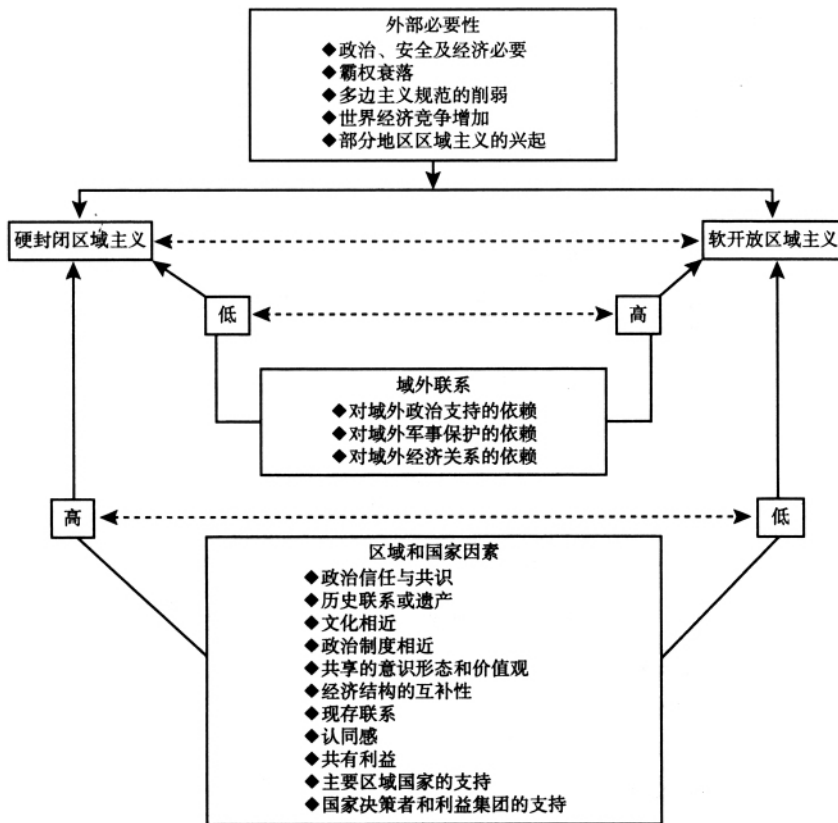


图4 经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

笔者注：实线箭头表明关系属性是单向的，虚线箭头表明关系属性是可转换的。

资料来源：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38, Figure 2.5。

（二）案例：东亚区域一体化

国际经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政治格局和国家利益决定的，^①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演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大最显著的因素决定——冷战政治和美国霸权。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②美苏争霸局面有所缓和，加上石油危机和尼克松“新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美国支撑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意愿也逐渐降低。特别是由于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的多边主义框架越来越难以解决诸如世界经济新秩序建设、全球变暖、能源危机及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等一些紧迫的问题，世界不同区域的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纷纷试图效仿西欧的联合，推动本区域内区域主义的发展和深化，以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维护国内政治稳定。

此时，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利用发达国家产业和技术转移的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创造了“东亚奇迹”。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从封闭自守转向改革开放，主动参与到区域和国际经济活动中，改变了东亚政治经济环境，且为更加有效的区域合作和区域市场的扩展提供了广阔前景，东亚区域内部的经济交往逐渐增多。然而，由于东亚国家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内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大的相似性，故大多采取了出口导向战略，并通过政策优惠吸引外资和技术，形成了对域外国家政治、经济上的依赖。这使得东亚经济区域主义起初就带有“软开放”区域主义的特征。

尽管东亚国家间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但真正推动完整地缘意义上东亚经济区域主义“觉醒”的是 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这次危机波及

① 对此的详细论述可参见 Robert Gilpin, “Three Models of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1, Winter 1975, p. 37.

② 1950 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占世界 GNP 的 2/5，而 1970 年则降为 1/3，1980 年更是降至 1/4。参见 M. Sakamoto, “Japan’s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J. H. Makin and D. C. Hellmann, eds., *Sharing World Leadership? A New Era for America & Japan*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89), p. 182.

了整个东亚区域,从侧面说明东亚国家间的实际联系(linkage)程度超出了人们之前的主观认知。各国开始迅速谋求区域制度化建设。

基于上述综合的分析框架,蔡认为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五大重要因素:有利各方的稳定的政治环境,生产要素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需要集体有效应对的区域复杂问题渐增,地理邻近带来的在货物、服务和人力流动上巨大的成本优势,不同程度的儒释道文化传统。

另一方面,尽管联合的力量强烈,更加制度化的区域一体化建设也面临着一些主要障碍。由于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差异,在东亚国家间经济因素的角色依然很大程度上限于政治关系之中,即传统观点的“低级政治”仍然通常会从属于“高级政治”;东亚经济体都是外部导向且严重依赖域外贸易;历史记忆也使得国家间信任脆弱。此外,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在世界经济中的不同地位使得它们往往追求不同的政策目标,^①它们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态度上也不尽相同。

尽管现阶段“软开放”区域主义不利于从根本上保护东亚区域各国经济安全,但面对组建区域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的困难和复杂性,这暂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方式。同时,东亚国家政府正寻求一种实用、渐进的方式谈判和缔结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以期将来真正区域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建设创造有利条件。^②

三、学术贡献及不足

凯文·蔡从加拿大学者的角度为我们分析现代区域主义的演进和扩散,特别是东亚的区域主义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该书在研究问题及解释框架、研究方法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① 对此的类似论述可参见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6—32页。

^② 见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 128 - 131。

冷战后，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世界主要区域出现了众多区域组织或机制，使得区域主义成为一股各国都不可回避的力量。然而，各地区域主义的动力不同，制度化水平不一。以往关于经济区域主义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制度化的区域一体化，特别是欧洲的一体化，而该书在明晰世界各主要区域的一体化特征基础之上，指出了相比欧洲和北美由政府谋划的、高度制度化的区域主义，东亚的经济区域主义肇始于一个自发的、非制度化的过程，它是在市场力量 and 经济发展需要的驱动下，随着迅速增长的区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而产生的（见表2），即东亚区域内贸易增长迅速，东亚与美国的贸易往来明显下降。这一区分廓清了人们对区域主义动力的模糊认识，并为作者构建一个经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蔡在解释一般的区域一体化现象特别是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形式和过程中，克服了强调体系压力或国家结构的不足，而是把区域主义的动力纳入体系压力、区域环境及国家内部结构的综合解释框架中，清晰地勾勒出不同内外环境对区域主义演进路径（即“硬封闭”和“软开放”的不同路径）的不同影响。欧洲的区域主义是在强大的体系压力下，为了谋求区域的和平及发展，各国达成了联合的共识；而冷战后的东亚在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压力没有两极格局下那么紧迫，且区域环境及各国内部结构的多样化使得区域层面联合的共识或认同尚未形成。当前，欧洲与东亚的区域主义在不同发展路径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的分析框架为我们思考东亚区域主义的前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地图”。

表2 东亚进出口额分布（1985—2003年）

	区域内			美国			世界		
	1985	1995	2003	1985	1995	2003	1985	1995	2003
出口额	67.6	343.1	576.3	103.9	235.2	312.1	295.7	1002.6	1473.0
占总出口比重(%)	22.9	34.2	39.1	35.1	23.5	21.2	100	100	100
进口额	67.4	340.4	563.9	45.4	158.1	148.4	253.9	899.7	1334.5
占总进口比重(%)	26.5	37.8	42.3	17.9	17.6	11.1	100	100	100

注：进出口额单位为10亿美元。表格为作者自制，表中数据引自 Kevin G. Cai,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gionalism: Explain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 94。

作者在分析区域主义兴起和演进的过程中,在研究方法上遵循了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其一,蔡有意识地试图摆脱以往大多数研究“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性特点,在提出研究假定的基础上,努力抽象出一系列相关的解释变量,较好地同时回答了研究的关键问题,即民族国家为什么会趋向于区域主义(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就是能减轻有关国家单独面对国际多边主义框架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①不同区域的区域主义为什么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并科学地选取了有说服力的案例。其二,作者也试图寻求对东亚“新”区域主义的兴盛进行简单的量化分析。作者借助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东亚区域内外的贸易及直接投资等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为我们展现了东亚区域内部经济依赖逐渐加深的进程。其三,作者在全书中娴熟地运用有关史料且有意识地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②清晰地展现了从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再到21世纪世界各地区区域主义的发展图景,尤其是把东亚与欧洲在体系压力、区域环境及国家内部结构方面作对比,为人们思考和探索东亚区域一体化的路径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借鉴,并让人们轻松地恰当的对比研究中对作者论证的观点产生信服。同时,这也为人们借鉴历史、比较政治等学科的有益知识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③

另一方面,本书虽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区域主义演进的综合分析框架,但在变量设置、关键因素的考察和简单量化分析方面也存在一些可供进一步商榷之处。

① 有学者从成本—收益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了考察各个国家对国际规则的公共选择问题,即个体逻辑怎样形成集体逻辑并促进主权国家走向区域一体化。此外,他认为,现行的全球性国际规则的合法性不够,因为强势国家拥有对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力,企图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大家的利益。见张宇燕在第四届北京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上的发言,载于吴彤、赵毅《地区化的国际政治——第四届北京国际关系博士生论坛综述》,《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118页。

② 目前国内的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研究在“比较”研究上还非常薄弱,对“比较”方法重要性的讨论可参见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需要真正的比较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20日,第231期,第15版;李巍《层次回落与比较政治学的回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7期,第52—56页。

③ 国内部分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富有启发的讨论。参见唐世平《浅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共识网,2012年2月10日,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ajd/sxyj/2012/0210_53384.html。

第一，蔡基于前人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关于区域主义的综合分析框架，从本文图4的框架图可以看出，作者包含的变量繁多，几乎把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可能因素尽收其中，过于庞杂，不够简约，有面面俱到之嫌，不利于判断出其中关键的（key）解释变量。此外，蔡在研究中模糊了区域和国家不同层面的变量^①，且考察的部分变量有交叉之处，如经济必要性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等，显示出其分析框架的繁冗。

第二，作者认为通过“软开放”的区域主义最终能带领东亚各国走向一个高制度化水平的区域主义。然而，“开放的区域主义”本身就存在一种悖论，因为“完全开放的经济不能实行歧视，而贸易上的区域化却要求实行歧视待遇”。^② 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进展缓慢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东亚区域主义一开始就采取了“开放”的形式，很容易受到域外势力的干扰^③，甚至被域外国家“各个击破”，进而形成了当前“软”或“弱”的形态。区域主义“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它是出于国家的理由而设计执行的”，^④ 因此，笔者认为，区域内部经济交流或相互依赖的加深仅仅是区域一体化谋求制度化建设的助力，而区域内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和安全竞争程度仍然是区域一体化推进和深入的决定因素^⑤，而冷战后的东亚区域安全的总体特征依然是竞争性的，故寄托于“软开放”区域主义推进东亚一体化迈向高制度化水平是

① 有学者指出，在分析使用数据时，还需要注意数据的测量层次问题，避免出现生态学谬误（ecological fallacy）。简言之，生态学谬误是指将高层次的信息、经验、发现应用到低层次的分析单位上。对此的具体讨论可参见 William S. Robinson, "Ecological Correl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Individu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5, No. 3, 1950, pp. 351-357; 刘丰、陈冲 《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数据库及其应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5期，第40页。

② 希夫、温斯特 《区域一体化与发展》（郭磊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③ 最近的实例就是美国企图在亚太区域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④ Ellen L. Frost, *Asia's New Regionalism*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008), p. 15.

⑤ 有学者认为，和欧洲、北美等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其他重要地区相比，东亚的安全构造是最不确定的。东亚地区安全中欠缺几乎所有的稳定要素，例如，没有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安全制度、大国崛起、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多样性、领土争议、历史问题以及冷战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残存等等。见朱锋 《“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第62页。

难以想象的。^① 此外，我们需要明确，“硬封闭”区域主义在政治、安全、经济等行为中并非是排他主义的，不是“闭关锁国”，它们更多只是以一种联合的姿态出现，提高与对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为本区域谋求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福利。相应地，这会进一步加深区域内部的经济、安全依赖，深化区域合作，提高区域主义制度化水平。

第三，蔡在书中使用了一些经济数据企图对东亚国家经济关系进行简单的量化分析，但他忽略了这种经济关系内部的质量问题。综观全书，作者主要使用的是东亚各国间或东亚区域与域外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方面的数据，并未深入挖掘这些数据的结构成分。目前，东亚国家绝大多数仍是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居于半边缘的地位，依然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存在很大的依赖，^② 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意味着东亚国家尚不能像欧洲和北美国家一体化那样通过自身的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因而也难以形成本区域主导的、高制度化水平的一体化。

四、对东亚区域主义未来的一点思考

蔡在书中并未指出区域国家应该选择何种区域主义，而是主张各区域根据体系压力、区域环境及国家内部结构的综合因素来选择适合本区域的发展路径。

从东亚的历史和现实可以看出，东亚各国面临着复杂的体系压力、区域环境和国内结构。在体系结构上，当年西欧面临着苏联的“考验”，也承受着美国的“压力”，这对推动区域一体化产生了刺激作用。但从欧洲

① 制度化水平与制度数量多少意义不同，因为数量多少不能代表运作质量和效力，甚至还会出现制度竞争的困境。见李巍 《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第7页。

② 有学者提出“无技术工业化”，其并不否定中国在某些尖端领域所取得的科技成就，而是指就整体而言中国高技术领域被外资牢牢控制、本国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因而严重依赖技术引进或外资技术转让，由此导致中国工业化进程缓慢这一不争的事实。此概念对中国在技术创新上的困境进行了理论概括。对此的讨论可参见岳健勇 《全球化是中国的强国之路吗》，《凤凰周刊》2011年第35、36期。

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看，西欧的联合很大的一个考虑就是在战后迅速恢复并向世界重新展示它的影响力，即西欧各国对联合在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自主预期才是其不断推进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冷战后的东亚并没有两极结构下西欧国家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那么沉重的担忧。区域周围除了美国似乎再没有第二个超级大国能对东亚安全形成威胁，且区域内主要国家至今尚未也不可能表现出征服整个区域的“野心”，这说明区域内国家对深入一体化的收益预期才是刺激一体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区域环境特别是区域安全方面，东亚表现出与西欧完全不同的形式。与西欧的多边安全机制或协定不同，东亚既存在独立自主的防务力量，也存在与美国签署的双边或多边防务协定，通常称为“轮辐结构”。东亚国家间长期痛苦的历史记忆使得区域国家间政治互信的形成面临极大的阻力：首先是区域主要大国——中日之间由于曾经的战争、殖民历史，加上现实的政治、领土争端，国内民族主义因素，双方缺乏战略互信，都希望主导区域一体化进程但又担忧由对方主导；其次是日本与其他东亚被侵略国之间经济交往水平大幅提升，但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致使后者对前者的意图不时保持一种怀疑态度等。这些都为美国势力介入东亚区域安全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甚至区域国家在美国的离间下对增进互信的信心进一步下降。以美国为首的“轮辐结构”得以持续获得动力，东亚似乎陷入了美国“玩转权力”（powerplay）^①的游戏。

有学者认为，美国在东亚提供安全保障的行为保证了区域的稳定与和平。^②但从以上简要分析中看出，正是美国对东亚事务介入过多，才使有

① “玩转权力”（powerplay）是指具有权力优势的国家通过构建非对称性同盟以最大程度上控制较弱盟国的行动。对此的详细论述见 Victor D.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09/2010, pp. 158–196.

② 参见（德）海因里希·克雷夫特《美国——亚洲稳定的关键》，《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2期，第51—53页；Evelyn Goh, “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8, No. 3, 2008, pp. 353–354;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 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1999, pp. 49–51.

关国家更愿意追随现有的可预期的“霸主”，致使该区域文化结构的塑造打上了美国“烙印”，相互间缺乏普遍的政治互信和区域认同，阻碍了该区域建立有效的安全机制、迈向更高层次的安全合作并形成诸如西欧那样的内部安全依赖。而诸如安全等“高级政治”问题上困境的减轻甚至化解仅寄托于经济、文化等交流难以彻底解决，这种内部安全依赖的低层次成为目前束缚东亚区域主义发展和深化的关键因素^①。也就是说，东亚区域内部分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并不能促进该区域的一体化进程。要真正深入推进可持续的东亚合作，必须在东亚区域内达成共识，必须由区域内的国家主持。因此，“软开放”的区域主义只是为外部势力干预东亚事务、维护其国家利益做了“嫁衣”，并不能实质性推进东亚区域主义的制度化水平。

^① 与本文类似的观点可参见王传兴《区域安全竞争中的东亚区域主义——基于对欧洲/北美区域主义的比较分析》，《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28—41页。

作者简介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

电子信箱: yanxt@mail.tsinghua.edu.cn

漆海霞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师。2007 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oceanqi@126.com

张勇进 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学院国际政治教授。

电子信箱: yongjin.zhang@bristol.ac.uk

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蒙塔古·伯顿国际关系学教授，哥本哈根大学和吉林大学荣誉教授。

电子信箱: b.g.buzan@lse.ac.uk

牛长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fenjin1980@163.com

王伟光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2008 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sunfire21@sina.com

李金潼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nklijintong@gmail.com

朱旭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11 级博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michaelzhuxu@yahoo.cn